

历 · 代 · 基 · 督 · 教 · 学 · 术 · 文 · 库

教会教义学 (精选本)

〔瑞士〕K·巴特著 〔德〕戈尔维策精选
何亚将 朱雁冰译

《教会教义学》是基督神学诞生以来的

三大历史里程碑之一

它重申基督教信经的义理

力图矫正

二百年来的神学方向

对教会提出了痛惜的批判

成就了

本世纪神学思想的丰碑

KIRCHLICHE DOGMATIK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教会教义学

(精选本)

.....

〔瑞士〕K·巴特著

〔德〕戈尔维策精选

何亚将 朱雁冰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会教义学:精选本/(瑞士)巴特著;(德)戈尔维策精选;何亚将,朱雁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ISBN 7-108-01167-0

I.教… II.①巴… ②戈… ③何… ④朱… III.基督教-教义 IV.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5707 号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IN HISTORY (ED. BY ISCS)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电脑制作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3 12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1.80 元

总 序

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

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40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60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19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

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基督宗教的历史有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社会层面是基

督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史；学术层面是基督信理在神学、哲学、伦理思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文库分为两个系列：Ⅰ．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Ⅱ．现代系列（16世纪至20世纪）。选题不限于历代神学家的著述，也包括历代重要哲学家、文学家的学术著述。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此类学典的汉译事业在整个西学汉译事业中仍显年轻，百年来积累的译述经验不多，有的甚至是初尝，如东正教学典的汉译，在术语酌定方面，尤为艰难。译述之辞不达意乃至错误，实际难免，文库编译者诚盼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

文库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播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刘小枫博士

1993年11月于北京

中译本前言

卡尔·巴特(Karl Barth)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神学思想家之一,其早年著作《〈罗马书〉释义》(1919),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惶然的思想语境中问世,产生震撼性的思想影响;自30年代初,巴特倾其半生精力撰述的卷帙浩然的《教会教义学》(1934—1967),堪称本世纪的神学思想丰碑。

教义学是基督教思想的教会性义理之学,阐述基督信仰的内涵,它有别于圣经神学、伦理神学或历史神学;圣经神学讨论圣经文本中包含的基督信息;伦理神学讨论信仰基督者的个体和群体(教会)之行为规范;历史神学则关注对上帝之言的认信反思的历史性。

教义学的内涵直接来自上帝的救恩行动所启示的所有信息,以基督教会的信经为基本论题。尼西亚信经述明:我信独一天主全能的父、独一主耶稣基督、圣灵、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和复活与永生。教义学旨在从义理上阐明信经的这五项基本信义,因此有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和救恩论。信经是最根本的教义,教义学是信经义理的阐释性论述。

巴特的教义学在现代思想的语境和困境中重述基督信仰的信经义理。信经是上帝的救恩行动启示给认信者的,从实

质上讲，教义学具有启示神学的性质，它以认信上帝启示的“我信”为前提，与自然神学以“我知”为前提不同。

信经早先是由个体认信者提出来的，但经过初代教会的公会议认定，因此，论释信经的教义学之论述带有认信群体（教会）的共同一致的性质：教义即教会一致认信的基督义理。那么，巴特又在其教义学著述的名称前特别冠以“教会的”界定，是什么意思呢？

自 18 世纪，尤其 19 世纪以来，基督教义学出现了转型，这场转型以教义思想的个体化和知识学化为标志：对信经义理的阐释可以而且只能是个体性的论述；在阐释中可以而且应当是知识学式的（wissenschaftlich），这样一来，信经义理阐释的教会性，就被削弱以至被排除了。施莱尔马赫的教义学论著采用了“信仰学说”的书名，是这场转型的标志。自此以后形成的系统神学学科，使基督教义论述日益个体化和学科化。

巴特的神学思想坚毅地抵制教义神学样式的现代转型，重申“教会的”教义学，乃是要保守传统的信仰义理之论述样式。这并非意味着巴特的教义论述与现代思想的问题无涉，亦非表明它固守现存教会僵化的信义论述。教义思想必须为教会的现存活力效力，必须依据信经批判教会的现实行为。事实上，巴特的教义学与现代文化思想亦有积极性的对话，他抵制的是让传统基督信义学说屈从现代文化和学科化的霸权。教义论述的合法性和学科的权威性来自于上帝的启示。

巴特的教义思想在当代的多元宗教语境中受到不少批评，最主要的批评之一即是所谓的“基督中心论”——上帝的启示唯有通过基督才传达到人寰。在我个人看来，值得捍

卫巴特的立场，审慎对待欧美当代神学界的反“唯基督论”的思想趋向。在多元完教的对话中，放弃“唯基督论”，基督信仰的身份将会变得模糊。中国知识界通过巴特的教义思想，可以认识到原质的基督教义论述，汉语神学的建构亦可从中汲取资源。

《教会教义学》的篇幅颇大，巴特为此花费了三十多年的心血，全书原计划为五卷，逝前留下了第四卷第四部未完稿残卷，第五卷未及撰述。近年出版的原版——研究版参校本（Vergleich Originalausgabe — Studienausgabe, Zürich, 1991）共 30 分册，即使对神学研究者，要读完这样的卷帙，显然有困难。本书是《教会教义学》的精选本，由柏林自由大学神学系教授 H. Gollwitzer 编选。编选者是巴特的学生、好友，熟悉巴特的思想，而且“精选本”第一版在巴特生前选编出版（1957），因此有相当的可靠性。

就我所见，《教会教义学》（精选本）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a. 1957 年 Fischer 版，包含七章；b. 据 a 版译成英文的版本（1961），此版增辑了第四卷第三部中的内容（a 版选编时，此部未出版）作为附录，这部分内容不是 Gollwitzer 节选的，而是英文版编者节选的；此外，英译本正文部分，有的选节在起始处比 a 版略多；c. 1987 年 München 版，此版由 Gollwitzer 重新选编，删去了 a 版中的第七章“男人与女人”，补选了教会论一章“世界中的教会”，第二章（基督论）则增加了第三节“圣言与人的话语”。补选的教会论一章篇幅很大，有近 80 页，几乎占 a 版三分之一的篇幅（a 版 212 页）。中译本综合了以上三个版本：以 a 版为基础，收入 b 版补选的作为附录的部分，从内容看，它们属于基督论，故列入中译本

第二章；收入 c 版中增补的教会论一章和基督论中的一节，同时保留了 c 版中删去的一章（“男人与女人”）。这样，中译本就比以上三个通行的版本都完整。

中译本共八章，第一章为上帝论（共五节），第二章为基督论，其中第 5 节为 c 版所补，第 4—6 节为 b 版之附录。每一章在正文之前，有节选者的简要说明，用黑体字排出。正文节选在每一段后附原版出处简缩标号：罗马数字表明卷数，阿拉伯数字表明部数，然后是页码。如 III. 3, 105，即卷三第三部，105 页。这个页码是原版页码，不是上面提到的原版——研究版参校本的页码。b 版补充部分（本译本 2 章 4—6 节）的页码，是原版英译本的页码。

六、七、八三章及二章第 3 节由朱雁冰教授译，其余章节及附录由何亚将博士译，笔者做了一些审定工作，c 版前言及文献说明（Gollwitzer 撰），亦由笔者译。巴特的这部著述论幅宏阔，文笔优美，中译颇为艰难。不当之处，尚盼识者垂察赐教。

刘小枫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香港隔田村

精选本导言

1.

卡尔·巴特的神学很优美。不仅仅在这种外在感觉上：他写得很好。他之所以写得好，在于他统一了两种东西，即激情与实事性（Sachlichkeit）。他的激情出自神学的目的，而他的实事性对于如此激动人心的一个目标来说是合适的。实事性意味着沉浸于这一主题之中，亦即客观性。根据对圣经的见证，巴特的主题是在耶稣基督中将他自己启示给世界的上帝。这是由于巴特的视角完全从信仰的状态上移开，转向信仰的内涵……因此，他写得很好，我们不必为他那牧师般的教诲而担心，水到渠成。但是，这一实事（Sache）是如此的摄人魂魄和富于挑战性，以至于真实的客观性必定与一种具有穿透力的强烈情感而不是虚浮的俗气相结合。这种情感与实事性的统一是巴特神学优美的基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谁像巴特那样，既非拘泥于圣经字眼，亦非单纯释经说明，既不随意构造，也不搬弄牧灵学的辩术，而是全然倾心于圣言本身来理解并解释圣经呢？巴特著作由此独特地闪耀出的完

美光辉，有谁能与之比拟？有谁拥有如此不倦不懈的坚韧和远见？这一美德得自于在他面前事物自己展开和呈现自身的一切伟大之处！我们必须直接回到托马斯，从所有的紧张和狭隘之中发现一种类似的自由，一种如此澈明的睿智和一种如此高尚的情操，这种情操在巴特这里常常采取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更加特别的是以一种显著的 *tempo giusto* 的风格，即一种生动的韵律，展示出来的。巴特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他来说，基督教是绝对凯旋式的。他并非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写作天赋，而是归于他亲历了见证，一种完全客观的见证，从事与上帝同工的有关的事情要求有最好的写作风格。对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来说，基督教是不属此世的、禁欲的和论战的。对巴特来说，它则是“上帝的使人敬畏的启示，是照耀着一切自然和实现着每一个允诺的永恒之光的启示，是上帝对他自己和他的造物的永远的诚心所愿的启示”。

这些言语适用于一种具有不寻常力量的神学著作，其荣耀不仅属于应受赞颂者，而且对作者来说也有份，他没有让教派的局限妨碍他至诚的感激，这一神学著作在过去 30 年里深深地影响了德语世界的新教教会的内在发展。而且，这一著作所得到的大量译介和反响，显示出它在其他地区的基督教会里所引起的注意，赞同和反对，都不容忽略。

自宗教改革以来，没有一个新教神学家像巴特这样受到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如此重视。他的著作作为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争辩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没有他的贡献，基督教对德国纳粹主义的反抗，或林林总总的基督徒和教会与东欧共产主义的斗争，以及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都是不可想像的。它对于年轻的亚洲和非洲传教教会，对他们在面对民族主义和

宗教调和主义运动的形势下所做出的重要抉择的影响，并不比对日常每周一次、不可计数的布道活动的影响要少。在这些布道中，讲道者和听众往往很少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一教义著作作为前导，布道将是多么奇怪的景象。作为文学和学术著作，它是书桌上的产物，然而，它并没有局限于文学或学术的范围，而是对 20 世纪基督教会的现实生活和无数的基督徒个人的实践行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它没有伴随着如此强烈的情感，因而可称之为 18 和 19 世纪的觉醒的话，它的最终效果可能就不会如此这般。

今天基督教的前景是什么？在面临和处于人性被吞没的社会大变动之中时，它必须对今天和明天说什么？在我们的已经僵化或很快就要僵化的教会组织里，怎样才能有新的转机？处在竞争和其他新兴政治宗教及东山再起的旧有宗教的攻击之下的基督教应怎样把握自己？在未来的技术世界之中，它怎样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一使命又是什么？基督教、福音和基督教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在巴特的著作中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成答案。他的确不是唯一发现这些问题并揭示有关它们的重要方面的一个人。但是，所有那些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们（我们的同代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回避这些问题吗？）都受到很好的劝告：不要忽视巴特的贡献。因此，从一开始他所选择的道路，就环绕和伴随着人们的注目，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注目不仅来自神学家，而且来自许多不是神学家甚至不是基督徒的人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作为学术界的同行，立即看出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像医生在病床前，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法官和政治家在他们的有关领域中的情形一样。基督教信息的独特性，它的主张与允诺，它

与人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关于自己的生死，现世与来世，以及宗教与哲学的通常途径等等的一切知识的区别，基督教的这种独特性很少以如此鲜明，如此富有持久力量的思想性，或带着对其信息的核心如此坚定信心的方式表现出来。

神学是基督教信息的展现，或阐明性的见解。这一陈述具有许多含义。巴特不厌其烦地为自己和他人揭示其内涵。它的第一层内涵就是神学的人性。神学并不产生或规定它的主题的样式。它的主题是被赐予的。它的主题在它之前就存在于那里并与它分离。它必须示之以其本来面目，就像它自己呈现出来的那样。它只能在它的主题之后去思想，跟随着主题的运动——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主题，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对象。它只能恭顺地使自己适从于主题的独特性，坚决拒绝那些把它引入与范畴、思维形式、概念以及一切人类思想总是具有的种种需求相一致的企图。这一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主题必居统治地位，而其他的一切必须服务之，并为能听命于它而感到荣幸。这似乎一眼看上去就是被巴特断然拒绝的所谓的“自然神学”的基础，即对一种普遍的思想框架的承认。这种框架或许来自于一种科学的普遍概念，一种既成的人类学，一种预设的哲学系统，或某些其他给定的对上帝的认知，如真实性与人，而衍为一种基督教的启示必须与之适合的并列的系统。然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正是由于这一拒绝，当他处于几乎孤立的境地，并与基督教神学的两千年传统决裂时，巴特建立起一个堡垒，反对用基督教信仰去曲意奉迎那种自以为是的日耳曼种族意识形态（参阅那篇被称之为《巴门宣言》的著名文章中他自己的说明〔见本书第一部分第 3 节〕）。启示不是一类中的一种。它是 *concretissimum*

(凝结体)，它不能投合任何其他的东西，而这应成为思想的起点，当我们从他那儿学会扭转从一般到特殊的通常的思想运动方式，而代之以从特殊——这一特殊——达到一般时，我们就开始理解巴特了。

神学的人性属于这样一类认识，它从来没有把握到它的主题。对于巴特来说，神学的主题不仅就是上帝自身，也是在他的启示中的上帝，上帝的启示只能由教会带给人们的信息中展现出来。这一连绵不绝的信息，是真正的主题，神学将其预设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作思考。它从来不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它从来没有取得超出暂时性的成果。它从来没有产生一个纯粹的教条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基督教的性质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而适用于任何时代。神学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伴随着总是重新转向新人新时代的基督的信息本身，它总是处在 *theologia viatorum*，即一种朝圣神学的路途上。在巴特自己的思想中，这一点表现在他时时准备着在还没有陷入过于安逸之前，就拔起帐篷继续前进。从1917年他的《〈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到《教会教义学》的最后一卷，他置身于无休止的修改之中，这令他自己和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感到诧异不已，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令人惊奇事情中的最后一幕——因为他才七十多岁，还年轻。他的思想具有伟大的系统性力量，而且拥有深刻的思想凝聚力。特别是他的重新和好的教义，真是结构完美的奇迹。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从一个简单原理推论，并预知一切的系统的创造者。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像一个谦卑的、永不停息的追随者，它是如此地富有生气和活力。

如果神学是阐明，这就具体地意味着它局限于经典，甚

至局限于教会承认为教规的经典，诸如标准、规范、基本和榜样的形式，用以维持它的信息的传递。换句话说，即局限于圣经。除了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很少有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清晰地展示了全部神学的解释特性，从传达对圣经整个内容的解释的方面来说，也没有一个基督信仰的教义阐述，表达得如此明白。在《教会教义学》中，用小号字体印出的注释性文字，通常是巴特在他自己表达思想主题的重要著作的写作之前所准备的，尽管它们在文中被放到了后面。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注释的暂时优先地位显示出不自由（即神学思想的依赖性），那么，它在印刷空间上的优先性显示出它的自主性、自由和个人的责任心。按照他的朋友们所选择的这个意味深长的标题来说，这不是一味盲从的重复，而是一种在谦卑的聆听之后，自由表达出的自己的理解——“被束缚者的自由”，这一原来打算用作 1936 年在他 50 岁生日时出版的那卷书的标题，被德国新闻审查官所禁止。

因为神学不是随意的思辨，而是思想，它涉及一个特定的地方，并被设定于具体的权威之下。甚至这一精选本的读者，也必须记住，是主题而不是作者，对其所发现的许多高度个人化的一系列思想负责。巴特关注的不只是作为对事物的一种个人看法的他自己的神学观点，或者与其他倾向竞争的神学流派的纲领。他关注的总是基督教信息的内容。对于巴特来说，每一个句子就像理解这一信息的一个建议，而且它伴随着一个问题，即这个信息是不是强加给这一理解的。因而甚至当我们遇见十分奇异的思想片断时，也不要即刻就拒绝它们，而是首先去问一下，在这信息自身之中是不是有所

根据？

巴特从不为独创性之名而刻意追求独创性。在他的许多论述中，他背离了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做得很轻浮，在反对教父传统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自负和专断。自早先的新教正统神学时代以来，不仅仅在解释形式方面，而且在讨论的内容方面，没有一部新教的教义学包含着这样丰富的历史-神学材料，它对宗教改革神学以及对教父和中世纪经院学派思想的深思熟虑，是任何一部其他教义学都不能比拟的。对这样的一种神学来说，聆听圣经的信息也就意味着虚心倾听他人的声音。甚至即使对他的重要反对者施莱尔马赫，巴特也保持有一种持续的关注，即考虑到施氏也许有一些积极的想法想要教给人们。实际上，巴特在争论中使用的有力武器一直是十分的仁慈和宽容，他把最终的判决权留给了唯一的最高审判者——上帝。正如他自己所说（IV. 2, 570），文字论战或“争吵”“在神学中必须十分小心和有选择地使用。我们不能与上帝，与耶稣基督，与圣灵抵忤。我们只能庆幸和感激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然最好也不要与圣经或作为圣徒同体的教会相悖。而且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最好也不要与邻居争吵。但是这里有十万条理由……去与我们自己争吵”。这一精神已由巴特自己所实践。例如，甚至在他起先激烈反对 19 世纪神学的时期，对于它，巴特献出了他最精辟的著作中的一本，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于他来说，传统既不是一种累赘的束缚，也不是一个神圣不可冒犯的命令。它是人们带着感恩和自由的心境所听到的父兄们的声音。传统从不妨碍他进入新的和未知的领域去探险。然而，他总是带着满足的心情说道，对于所有的“我必须经

历的紧要的自由……我总是体认到一种对基督教传统的辽阔视野的愉悦之情”（VI. 2, xi）。

这种与传统的和睦相处，是和传统与革命的混血儿十分不同的，它在《教会教义学》里是天主教的要素，就像紧要的自由是新教的要素一样。普世教会的气息是这本著作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反映罗马天主教立场的文章里，其中东正教和虔信派的神学观点被含蓄或明白地采纳或听取，专家们被迫不断地询问自己：他所想说的是不是得到适当的阐明，并以更符合圣经传统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这里不能有对巴特新教改革背景的误解。他从来不隐瞒对遭到严重诽谤和误解的加尔文的同情。但是，若因此而把他描绘成一个在一种狭隘定义下的新教改革或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则是不明智的。教会的定义并不是基督教团体的压缩。他出其不意地把教会划归天主教这一现象形容为由于没有公义而带来的丑闻。神学作为一项严肃的事情，必须准备坚定而毫不含糊地对各种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它必须时刻准备在教派冲突中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它也必须意识到基督教团体的传统“存在，以便我们可以审视穿越他们（不是一次而是持续不断地），而不是为了我们可以回到并停留在它们之中”（III. 4, 前言）。因此，路德和加尔文神学是新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巴特作为一个宗教改革的公认继承者，对重新发现路德和加尔文的神学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然而，尽管常常因为他的正统派立场而受到责备，他终究还是强烈地反对一切正统派重回老路的主张。所以，这并不令人惊奇：在与罗马天主教争辩中，他的神学一方面被当作宗教改革目的的最彻底的实现（E. Przywara），而在另一方面又被视为开创